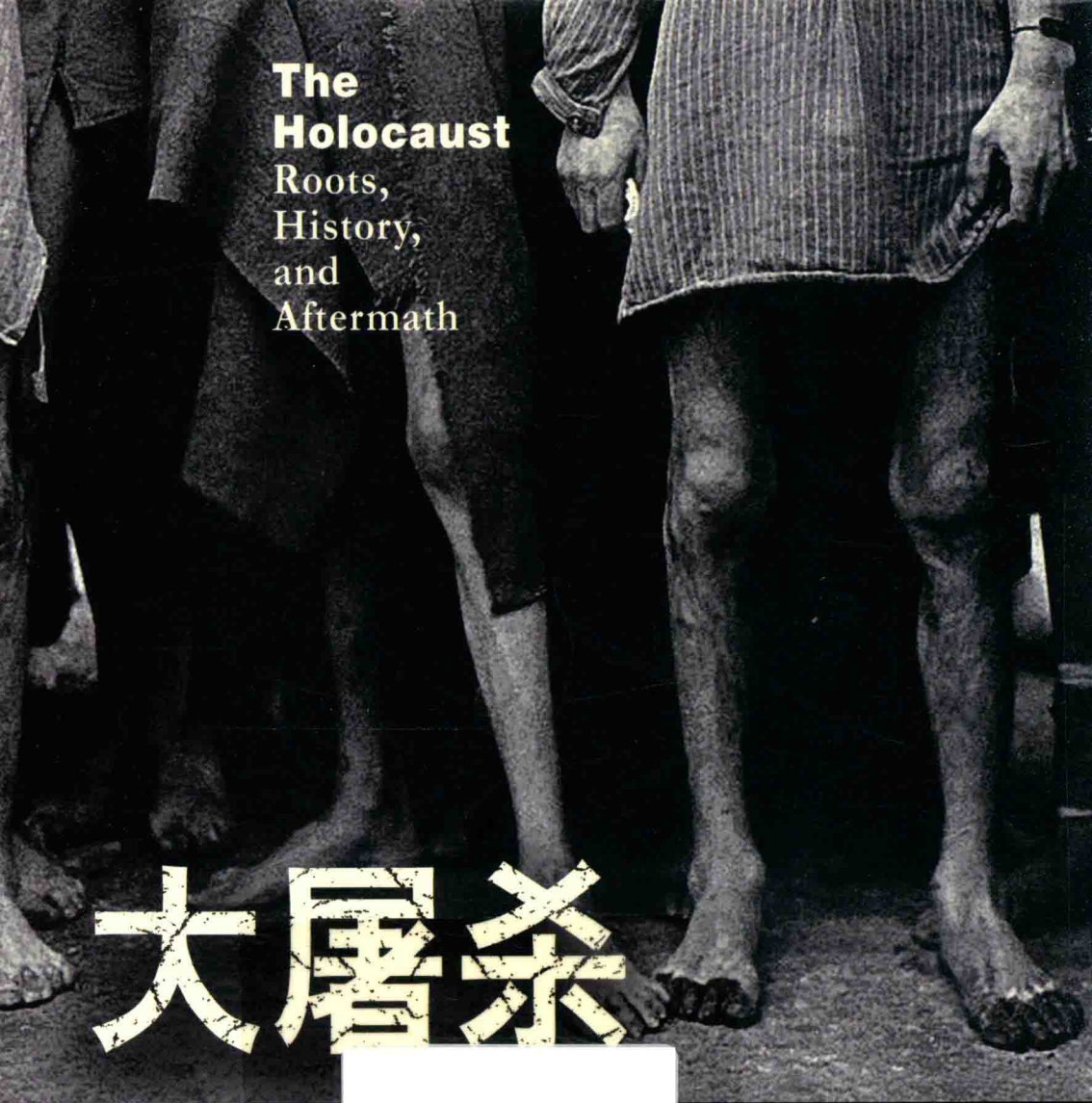




**The
Holocaust**
Roots,
History,
and
Aftermath

大屠杀

根源、历史与余波

[美] 戴维·M·克罗 著 张旭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Holocaust**
Roots,
History,
and
Aftermath

大屠杀

根源、历史与余波

[美] 戴维·M·克罗 著 张旭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屠杀:根源、历史与余波/(美)戴维·M.克罗
(David M.Crowe)著;张旭译.—2版.—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The Holocaust: Roots, History, and
Aftermath

ISBN 978-7-208-15072-0

I. ①大… II. ①戴… ②张…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
战-犹太人-历史-研究 IV. ①E195.2 ②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9000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王晓阳

大屠杀

——根源、历史与余波

[美]戴维·M·克罗 著 张旭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50 1/16

印 张 50.5

插 页 4

字 数 864,000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072-0/K·2723

定 价 158.00 元

译者序

时值华盛顿最美丽的樱花季，跟随着接踵的人群，译者走进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正是本书扉页上的那句话：“你们是我的见证。”微微的一行字，孤零零地镌刻在巨大的黑色墙壁上，除了几扇小窗之外周围空空荡荡，但每一个目睹此景的参观者，胸中却都情思如潮。整个纪念馆内，触动人心的情景随处可见。无论是奥斯维辛的焚尸炉和堆积如山的受害者的头发与鞋子，还是运送囚犯的闷罐火车厢，都令人真切地感到无比的恐怖。连接南北楼的玻璃走廊内张贴着两千多张照片，记录的一个个幸福时刻，都属于东欧某小镇的一百多个犹太家庭。在名为“记住儿童：丹尼尔的故事”的展厅内，则陈列着根据这个小男孩的日记还原的生活点滴。而如今这些原本如此迷人的记忆，却都令参观者纷纷驻足涕零、不能自己。原因很简单，也很残酷，这些记忆的主人公，都已成为“大屠杀”千百万受难者中的一员。

当译者在这座如监牢般黑暗、压抑的庞大建筑内游走之时，这本几近翻译完成的《大屠杀：根源、历史与余波》的每章每节、每字每句，突然都确切、鲜活地映入脑海。本书前三章探讨“大屠杀”的根源。对犹太民族的历史和欧洲反犹主义的演变进行适度论述之后，从第四章开始，作者将读者逐步带入“杀戮年代”本身。克罗通过长篇引用受害者的日记或证词，让他们亲口讲述自己的经历。作者还有效使用救援者的资料——包括著名的奥斯卡·辛德勒，表明面对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少数民族群，旁观者并不全是心怀敌意或漠然处之。最后一章则讨论“大屠杀”延伸至今的余波。每章前面的大事年表、后面的参考书目（包括原始史料和次级史料，还有很多网上资料）以及大量图片和地图，都成为本书主体内容的有益补充。再加上作者生动、流畅的文字，这一切都使本书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大屠杀”教科书，还是一部对普通

读者也颇具吸引力的历史著作。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但凡遭遇难题,总是自然而然地向母校、向导师求教,这里特向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诸位学者表示感谢。我还想谢谢我的父母,特别是已届花甲的母亲,竟以惊人的效率,帮助我完成了全书的文字校对。我希望自己的第一本译作,作为对父母爱意的表达和恩情的回报,存留于世。必须声明的是,译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专家、读者斧正。

笔触至此,译者又想起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圆形追思厅入口对面的石墙上,刻着这样一段话,在点点烛影的倒映下分外动人:“仔细守护你自己和你的灵魂,以防忘记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你应该让你的孩子及他们的后代知道这些事情。”是的,对于这场人间浩劫,我们绝对不应忘记,我们必须让自己的孩子们知道。

张 旭

2012年6月8日

本书的写作始于约十年前,但后来我为了完成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的传记,又不得不将它搁置一边。我认为,本书可以反映近30年来我在“大屠杀”领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外写作、演讲与研究的成果。30年间,我曾是“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英文缩写为USHMM)教育委员会和“北卡罗来纳州大屠杀理事会”(英文缩写为NCCH)的成员。在过去的15年中,我在以上两个机构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表过多次演讲。这些学术活动,再加上我承担的关于“大屠杀”课程的常规教学工作,帮助我开创了一些相关课题的主题、材料和深度的研究方法,并将它们应用于本书。此外,在将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作为研究核心的同时,我还试图顾及另外一些被纳粹德国的雅利安主义视为民族或生物学敌人的族群,包括罗姆人以及身心残疾者等。

对研究“大屠杀”的学者在教学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挑战,我深有体会。在我的课堂上,学生们需要完成大量的阅读。在本书中,我也将引入同样深度和广度的阅读覆盖面。当然,没有哪本教科书能够做到令所有“大屠杀”课程的讲授者完全满意。鉴于我的课程既针对本科教育层面,也向法学院学生开放,所以,这本教材试图满足本科生、研究生和法学院学生三个群体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的课程都是以一次深入、彻底的考察活动开头的。考察的对象,不仅包括西方世界反犹太主义和反闪米特主义的根源,还涉及基督教时代到来之前,犹太民族的状态。我坚信,1933年之前,在基督教世界逐渐升腾的对犹太人和闪米特民族的敌视情绪,营造了“大屠杀”爆发的社会氛围。这种敌视情绪还带来一些其他东西。而在德国,反犹太主义在纳粹统治之下进入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因而展现出其最具破坏性的一面。

幸运的是,30年来,我所在的大学一直非常鼓励和支持本科生科研。我的“大屠杀”课程和德国史班级里的每一个学生,都必须承担一个科研项目。每学期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我都拿出来“贡献”给学生,让他们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展示研究成果。本书的设计也考虑到学生科研的需要。除了在每一章的开头都添加一个大事年表之外,我还试图附上一个广泛、易得、包含原始与次级史料的参考书目,以方便学生们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我还尽可能多地使用基于网络的资料,以帮助学生锻炼解释能力——这一能力对历史学、国际问题和法学研究都至关重要。我的参考书目力争全面,除了关于“大屠杀”的众多著作,还可能包含本书涉及的背景和讨论的主题等各项领域。

我的编辑、韦斯特维出版社的史蒂夫·卡塔拉诺(Steve Catalano)曾给予我无法计数的支持和鼓励,我想向他表示感谢。在撰写奥斯卡·辛德勒传记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史蒂夫,事实证明他是当今出版界极其罕见的那一类编辑——作者型的编辑。我还要感谢我的系主任吉姆·比赛特博士(Dr. Jim Bissett),以及伊隆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史蒂夫·豪斯博士(Dr. Steven House)。他们不仅支持我写作本书,还创造了一个激励此类专业活动的学术环境。此外,肖鸿林博士(Dr. Honglin Xiao)为本书绘制了地图,对我帮助良多。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人生伴侣”^①凯瑟琳(Kathryn),感谢她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表现出的善良、耐心与积极帮助。

我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已故的老戴维·M·克罗(David M. Crowe),还有我的岳父马尔科姆·理查森·摩尔(Malcolm Richardson Moore)。他们在我的生命中意义重大,谨以此书表示微薄的谢意。

① 此处原文为一个第绪语词“Beshert”,意思是命运、定数、天意,通常用来指命中注定的人生伴侣,具有浪漫色彩。——译者注

目 录

译者序 1

前言 1

引言 1

第一章 犹太民族的历史

基督教世界反犹偏见的起源及其在宗教改革时代的演进 6

犹太人的起源 8

犹太人、希腊化与马加比(哈斯摩)起义 11

反犹情绪的根源:犹太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冲突 14

犹太教、犹太人和即将到来的基督教 14

犹太战争和民族大起义(66—70) 16

犹太教、基督教和巴尔·科赫巴起义 17

君士坦丁、基督徒和犹太人 19

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犹太人 21

中世纪早期和拜占庭帝国的犹太人 24

十字军东征和地中海世界的犹太人 27

教皇英诺森三世和犹太人 32

中世纪高利贷业:基督徒与犹太人 34

杀人祭神的传说 35

死亡时代:中世纪晚期的犹太人 37

西欧犹太人被驱逐	38
黑死病	39
最后的耻辱：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被驱逐	41
新教改革	43
罗马天主教廷、犹太人和反宗教改革运动	49
结论	50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资料	51

第二章 犹太人、启蒙运动、解放，以及 20 世纪早期种族性反犹太主义的兴起

犹太人在宗教改革之后的欧洲	61
启蒙运动	62
1789—1799 年法国革命、拿破仑一世与犹太人	72
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犹太人	74
19 世纪反犹太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起源	76
一战之前德国、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的政治性反犹太主义	84
《锡安长老议定书》	105
结论	107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资料	108

第三章 阿道夫·希特勒的世界，1889—1933 年

战争、政治和反犹太主义	120
阿道夫·希特勒：家族起源及对其犹太血统的质疑	122
结论	151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资料	152

第四章 纳粹党当权时期，1933—1939 年

人种改良学、种族和生物学；犹太人、残疾人和罗姆人	159
两战之间德国的犹太人社团	161
1933—1935 年：德国的纳粹化和“犹太人问题”	163
《纽伦堡法令》	175

纳粹雅利安奥运会(1936 年)	179
“雅利安化”运动与通向“水晶之夜”的道路	183
早期强制绝育运动	192
安乐死:理论与纳粹党的实践	195
罗姆人(吉卜赛人)	198
同性恋者	206
结论	208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资料	210

第五章 战时纳粹德国,1939—1941 年

“安乐死”与身心残疾者;隔离区与犹太人	220
儿童“安乐死”计划	222
成人“安乐死”计划	226
通向战争之路与德国入侵波兰	231
波兰的种族战争:波兰基督徒	233
“总督府”的创设:纳粹德国的“种族实验室”	237
两战之间的波兰犹太人	239
在波兰针对犹太人的战争	241
对总督府境内犹太人的人身与经济剥削	243
“尼斯柯计划”、卢布林保留区和马达加斯加	244
“马达加斯加计划”	245
德占波兰犹太人隔离区的建立	248
罗兹(即里兹曼施塔德)犹太人和罗姆人	249
华沙	254
克拉科夫	256
克拉科夫隔离区内的统治、生活和工作	260
强制劳动与食物	265
结论	268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资料	269

第六章 入侵苏联与通向“最终解决”之路

苏联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	285
-------------	-----

茨瓦滕狄克和千亩:维尔纽斯的“国际义人”	286
“巴巴罗萨行动”和集体屠杀计划	288
特别行动队	291
国防军	296
德军入侵苏联	297
德国在苏联的早期屠杀行动	300
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的胁从行径	302
匈牙利及罗马尼亚的胁从	310
罗姆人和残疾人	312
结论	322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资料	323

第七章 最终解决,1941—1944 年

灭绝营和集体屠杀实验	338
“最终解决”方案的策划	340
从大德意志帝国转运出境	343
特雷西恩施塔德	344
“死亡机器”实验	348
万湖会议	351
最终解决	356
切尔姆诺	357
“莱因哈德行动计划”的灭绝营:贝尔泽克、索比堡与特雷布林卡	360
奥斯维辛	373
“死亡工厂”:奥斯维辛二号营区比克瑙	377
吉卜赛家庭营	380
奥斯维辛一号与二号营区的医学实验	382
奥斯维辛三号营区布纳/莫诺维兹	386
奥斯维辛的抵抗	387
马伊达内克	388
主要隔离区的清算	392
结论	408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资料	408

第八章 西欧及纳粹盟国的“最终解决”	422
西欧的“大屠杀”	424
纳粹盟国	443
结论	485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资料	487
第九章 大屠杀与欧洲中立国扮演的角色	
历史与当今	511
欧洲中立国	512
结论	559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资料	561
第十章 解放、难民与寻求正义	
欧洲、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罪行调查与审判	587
集中营与灭绝营的解放	589
难民：犹太人和罗姆人	595
对首要战犯的审判	60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623
西欧的战争罪调查审判	628
东欧和苏联的战争罪审判	638
结论	658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资料	660
专业术语表	683
附录一 大屠杀期间各国犹太人估计死亡人数	688
附录二 大屠杀期间各国罗姆人估计死亡人数	690
附录三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民族义人”	692
附录四 党卫军军阶(基于美军陆军军职)	693
附录五 德国陆军军阶(基于美军陆军军职)	694
索引	695

“大屠杀”(英文为 holocaust)一词起源于希腊文“holokauston”,现在则用以描述 1933 年至 1945 年间纳粹德国及其胁从给犹太民族带来的那场灾难。古代的犹太裔学者将希伯来文“olah”翻译成希腊文时,也使用了“holokauston”这个词。其实,“olah”用英文表达是“祭祀之物”的意思,而它的希腊文同义词“holokausto”也有“被烧成灰烬的祭牲”之意,正如《旧约·撒母耳记上》第 7 章第 9 节中写到的:“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作全牲的燔祭^①,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1]

对犹太人来说,“大屠杀”这个词因为曾与数百万同胞的苦痛联系在一起,因而呈现出深厚的情感与历史含义。“大屠杀”一词可查证的首次使用是在 1895 年,《纽约时报》在评论奥斯曼帝国对境内亚美尼亚人的残害时,宣称它为“另一次亚美尼亚人大屠杀”。^[2]希伯来文“大屠杀”(写作 sh'oah 或 shoah)第一次出现,则是在 1940 年“波兰犹太人联合援助委员会”出版的一本名为《波兰犹太人大屠杀》(希伯来文为 Yehudi Polin)的小册子中,用以描述当时笼罩在欧洲犹太人头顶的恐怖氛围。最初的犹太裔评论家用希伯来文“毁灭”(写作 herban)来形容当时的情景,它起源于公元 70 年的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被毁事件。然而,到 1942 年,特别是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事务代办处”(英文缩写为 JA)在其 11 月份的通讯中使用“大屠杀”(写作 shoah)来形容当时正在全欧洲爆发的惨剧之后,这个词开始日益频繁地出现。

近年来,学界正着手研究纳粹“种族灭绝”罪行的另一些受害者——比如吉卜赛

① 燔祭是《旧约·利未记》中提到的第一种祭物,需要将所献上的整只祭牲完全烧在祭坛上,全部经火烧成灰。这种祭不可为任何人留下一点肉,被认为是最好的一种祭,也是犹太教允许非犹太人到圣殿献上的一种祭。——译者注

人和残疾人。“种族灭绝”一词由波兰犹太裔学者拉法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 1901—1959)于1943年首次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伊始,莱姆金就逃离了波兰,定居在美国。后来在他的著作《轴心国在沦陷欧洲的统治:占领法规、施政纲领、纠错诉求》(1944年)中,莱姆金花了整整一章的笔墨来分析“种族灭绝”的含义。二战后期,他进入“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负责向特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 1908—1998)提供咨询,后者成为纽伦堡审判期间美国的主要检察官之一。莱姆金将“种族灭绝”定义为“系统性地、有计划地、运用各种方式对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实施灭绝性的屠杀,目的在于损毁对其团体认同至关重要的基础”。^[3]

- 2 在莱姆金看来,“种族灭绝”不仅指对团体成员生命的杀戮,还包含其他方式的迫害。这些方式虽不致命,却可损害或摧毁团体的基本特性、习惯或制度,从而削弱这个团体的力量,或者使其成员丧失“独立精神、尊严和安全感”。莱姆金还将“种族文化灭绝”作为“种族灭绝”的方式之一,前者是战后由法国人创造的词,用来描述扼杀一个团体的文化——而非其成员生命——的行为。^[4]

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上,“国际军事法庭”(IMT)并未以“种族灭绝罪”起诉纳粹德国的主要领袖,而在后续的一系列同盟国战犯法庭上,它却成为一项罪名。此外,波兰政府也曾以“种族灭绝罪”起诉本国的战犯。到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种族灭绝公约》,将“种族灭绝”行为定义如下:

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成员生育;

强迫转移该团体之儿童至另一团体。^[5]

很多专家认为联合国对“种族灭绝”的界定存在缺陷,因为它没有对旨在彻底毁灭某团体的暴力行径与其他非暴力形式的攻击作出区分。况且,《种族灭绝公约》还未涉及那些出于消灭某政治派别和社会阶层的目的,而针对其成员的谋杀性行为。尽管存在保留,联合国对“种族灭绝”的界定还是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1950年,以色列加入《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这表明它也认可了以上《种

族灭绝公约》的释义。在本国的《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法》(1950年,第5710号)和《纳粹及纳粹胁从惩治法》(1950年,第5710号)中,以色列也同样采用了这一界定。后一部法律包含一个名为“危害犹太民族罪”的条款,并在1961年被用于指控和审判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这个特别的“危害犹太民族罪”条款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大屠杀”的研究者和幸存者认为德国人对犹太民族犯下的罪行是独特的、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种族灭绝”的范畴。1950年担任以色列司法部长的品卡斯·罗森(Pinhas Rosen)就曾说过,虽然纳粹及其胁从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犹太人永远不会“遗忘和原谅”大屠杀时期他们对本民族同胞犯下的罪行。^[6]

其实,与犹太民族遭受的伤亡和苦难相比,“大屠杀”这个概念的含义、它究竟包含哪些行为,并不那么重要。“大屠杀”的施行者和受害者都是人。在为这幕不可名状的悲剧寻找证据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被上文的定义束缚住手脚,否则就无法充分认清这场在1933年至1945年间肆虐欧洲的人间浩劫。要真正理解“大屠杀”,我们必须从它的根源着手。而“大屠杀”的根源,就埋藏在其主要受害者——犹太民族——的历史之中。研究犹太人的历史虽令人痛苦,却能够解释“大屠杀”的狂热与那些古老的偏见之间的关系,并凸显这个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宗教和种族遗产,而这些遗产在“大屠杀”之后都永远地失去了。“大屠杀”期间死于纳粹德国及其同伙之手的犹太人是母亲、姐妹、婶姨、父亲、儿子和女儿。他们哭、他们笑、他们祈祷、他们歌唱。他们珍爱生命,他们和我们一样为生计而奔忙。然而,这些“普通人”却都被杀害了,原因仅仅是他们生而就属于某个宗教、文化、种族或民族群体,抑或是患有某种身体或心理疾病,而这些都为纳粹德国社会所不容。他们的损失也是全世界的损失,是人类生命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损失。

然而,“大屠杀”的另一方——其施行者,他们也是人。如果将“大屠杀”视为精神病患者或者虐待狂的行为,它给人类带来的永久性伤痛和恐惧也许会稍微容易承受一点。纳粹时期很多德国人的确就是精神病患者或虐待狂,然而,另一些卷入“大屠杀”的人,另一些必须对这场集体残害行径直接或间接负责的罪犯们,其实也仅仅是“普通的”德国人、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等等。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长于虔诚的罗马天主教、新教或东正教家庭。这些刽子手也有家庭和职业,战争结束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重新回到亲人的怀抱,操起战前的老本行。然而,对这些“普通的”男人和女人来说,在他们生命里的某一个特殊时期,他们将根植于西方犹太教—基督教文明的道德信条抛之脑后,而直接或间接参与进这场导致数百万同胞

丧命的集体杀戮之中。本书既是一部关于无辜受难者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扼杀宝贵生命的行凶者的历史。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资料

原始史料——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1—5.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260A of December 9, 1948.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http://www.unhchr.ch/html/menu3/b/p_genoci.htm.

The Tanakh: The Holy Scripture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85.

次级史料——

Akçam, Taner. *A Shameful Act: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the Question of Turkish Responsibility*. Translated by Paul Bessemer.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Balakian, Peter. *The Burning Tigris: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America's Respons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Chalk, Frank, and Kurt Jonassohn.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Genocide: Analyses and Case Stud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Lemkin, Raphael. *Axis Rule in Europe, Laws of Occupation, Analysis of Government, Proposals for Redres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44.

Oron, Michael. “The Mass Murder They Still Den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10, 2007): 1—11.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74>.

Schaller, Dominik J., and Jürgen Zimmerer, eds. “Raphael Lemkin: The ‘Found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ocide Convention as a Historian of Mass Violenc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7, no. 4 (December 2005): 441—559.

Segev, Tom. *The Seventh Million: The Israelis and the Holocaust*. Translated by Haim Watzma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3.

注释:

[1] “I Samuel,” *The Tanakh: The Holy Scriptures*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85), 427.

[2] Peter Balakian, *The Burning Tigris: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America's Respons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3), 11; Michael Oren, “The Mass Murder They Still Den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10, 2007): 10n1.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74>.

[3] Raphael Lemkin, *Axis Rule in Occupied Europe, Laws of Occupation, Analysis of Government, Proposals for Redres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1944), 92.

[4] 关于 Lemkin 的更多信息, 参见 the special edition of *th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7, no.4 (December 2005), “Raphael Lemkin: The ‘Found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ocide Convention’ as a Historian of Mass Violence,” 441—559, ed. Dominik J. Schaller and Jürgen Zimmerer.

[5]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1,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260A of 9 December 1948,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Switzerland, http://www.unhchr.ch/html/menu3/b/p_genoci.htm.

[6] Tom Segev, *The Seventh Million: The Israelis and the Holocaust*, trans. Haim Watzma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3), 334.